

# 外交十记

外交十记

钱其琛◎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钱其琛 ◎著

---

# 外交十记

W A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交十记 / 钱其琛著.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0

ISBN 7-5012-2110-3

I . 外... II . 钱... III . 外交史 - 史料 - 中国 - 现代 IV .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0485 号

## 外交十记

*Waijiao Shi Ji*

---

**著 者 / 钱其琛**

**供 图 / 钱其琛 外交部档案馆 新华社**

**责任编辑 / 袁路明**

**图文编辑 / 袁路明 王 垒**

**责任出版 / 刘林琦**

**责任校对 / 王 静**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 [www.wap1934.com](http://www.wap1934.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印张 / 970 × 640 1/16 28 1/4 印张 20 面插页 220 千字**

**印 数 / 136001—156000 册**

**版次印次 /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4 年 2 月第六次印刷**

**定 价 / 48.00 元 (平装)**

**版权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自序

2003年3月18日，全国人大换届大会闭幕，我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新老交替，符合自然规律——而且是有利干国家发展、社会前进的规律。老干部退下来本身，就可以看做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贡献。

我已经75岁，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有时间，看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些以前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

今春，兴之所至，曾做五言诗述怀，其中有这样两句：“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所谓“开新卷”，不一定只是读新出版的书，只要是沒有读过的书，对我都算是新书。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希腊先贤，广场辩论；文、史、哲、传记、回忆录，都是人类智慧。像英国科学家霍金《时间简史》这样的“天书”，虽然难懂，读了也启发思想。人们常说要改造世界观，看来，还要改造宇宙观。宇宙之大，无边无尽，万物自有规律，人不应被自己的经验和思想所束缚。

再说“叙往事”。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

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

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现在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故称之为《外交十记》。

是为序。

2003年7月30日

# 目录

自序

6

中苏关系正常化

外交十记之一

1

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

外交十记之二

41

飞往巴格达

外交十记之三

69

东京的“葬礼外交”

外交十记之四

109

通往汉城

外交十记之五

137

黑云压城城不摧

外交十记之六

163

---

<b>从苏联到俄罗斯</b>	外交十记之七
	203
<b>非洲情结</b>	外交十记之八
	243
<b>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b>	外交十记之九
	289
<b>港澳回归</b>	外交十记之十
	319

## 附录

<b>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五篇演讲</b>	357
经济全球化和其他	359
谈谈国际关系研究	374
当前国际形势的若干问题	387
“9·11”之后的美国	407
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419

## 外国人名索引

438

## 后记

450

# 中苏关系正常化

---

## 重大决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

“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



◎ 1982年3月26日，就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

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

陈云同志提出了采取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问题。信息的传

递，既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见使馆人员或派人前去访问，恐怕过于正式，而当时中苏之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渠道。

小平同志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当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在他启程前，我们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我们苏欧司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第一远东司

| © 1982年伊利切夫（左）在北京。 |



---

司长贾丕才特地中断休假，从莫斯科郊区别墅急忙赶回，陪同前来。

会面时，于洪亮同志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方建议先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与此同时，双方还应考虑找到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苏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的问题。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问题上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总之，只要双方站得高，看得远，有使两大邻国恢复睦邻关系的诚意，从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就可以为两国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至于交换意见的形式，双方可以协商。

伊利切夫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他资格很老，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当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消息报》、《真理报》主编，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赫鲁晓夫下台后，他退出中央领导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长。他为人稳健，处事谨慎，说话时字斟句酌，给人的印象是过于严谨而稍欠灵活。听了我方的说帖后，他做出的回应仍是惯常的外交辞令。他说，你的



|◎作者会见贾丕才。|

想法，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主动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时，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态，好像并未完全觉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倒是当时在座的中国通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说帖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这次会见以后，于洪亮即转赴华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专程来莫斯科的，同时也给苏方考虑和准备回答的时间。

8月18日，当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会见伊利切夫时，伊利切夫谈话的态度有所变化，口气也缓和多了，称已将中方的想法报告了中央，苏方将做出正式答复。

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作为正式答复的备忘录，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苏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们认为，苏方对我方信息的反应是积极的。小平同志随后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里，亲自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 磋商开始

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中苏政治磋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使命。苏联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谈判对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为主管非洲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校长，伊利切夫从未主管过中国事务，但却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国副外长先后进行过长达十年的中苏边界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被苏联外交界